

【县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专题】

追寻内生的力量

——“隙地”“狭地”“边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

吴重庆

(中山大学 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州 510275)

摘 要: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观察 2010 年至 202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全国农业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县级区)常住人口增长情况。在这些常住人口出现增长的农业县里,又大体可以分为省际结合部的“隙地”、东南沿海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二至四倍的“狭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地”,简称“三地”。探讨“三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的地方社会经济逻辑,并深入具体区域,结合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地方传统,理解农民的行为选择及流动,追寻区域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具体的区域中认识中国农村。

关键词:隙地;狭地;边地;空心化反向运动;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3)01-0029-13

农村空心化是经济全球化及城市化浪潮席卷下的产物,空心化的实质是乡村的各种生产要素不可逆流向城市,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2 年 1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全国城镇常住人口 9142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05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49835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157 万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50429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53 万人,其中流动人口 38467 万人,比上年增加 885 万人^①。人口流动的大方向还是“孔雀东南飞”,集中于“胡焕庸线”^②东南一侧。2020 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93.5%,西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6.5%^[1]。可以说,今天中国人口分布基本上还是与“胡焕庸线”吻合。现在的问题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内部的人口分布出现严重不平衡,农村人口更加明显地向大城市或者城市群集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进,农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2021 年 5 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尤其是 2015 年至 2020 年,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从 39.42%降低到 33.22%;相应地,省内流动人口比例则从 60.58%提高到 66.78%。而在人户分离总人口比例方面,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3.39%急速提高到 2020 年的 8.28%^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返省、返市、返县、返乡的趋向。

在此趋向之下,部分远离大城市的数省交界处、“人稠地狭”的东南沿海以及大西南民族地区的农业县,其常住人口不减反增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今天依然保持“县”这一行

收稿日期:2022-11-18

作者简介:吴重庆,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索引号 410A04-0402-202201-0014。

② 胡焕庸于 1935 年以黑河(爱辉)—腾冲线揭示中国人口分布规律时,“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96%,西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4%。

③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年。

政建制的,一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空心化区域,但偏偏在这些区域,却出现农村空心化反向运动的某些迹象。

一、区域视角

研究中国农村,需尽可能分区域类型。如果把中国农村想象为同质化的农村,那就将中国农村符号化了,也就不可能对区域的特殊现象保持敏感。长期扎根田野的贺雪峰及其团队比较关注中国农村研究的区域差异视角,强调需要深入区域层面。贺雪峰继提出村庄社会结构的南北差异之后^[2],近来又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决定了西部农村不应该以东部农村作为学习的榜样^①。不过,“南方”“北方”或者“东部”“中部”“西部”依然免不了有抽象之嫌。

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认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3]1},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谁就控制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导致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将key economic areas直译为“关键经济区”应该更符合作者原意。“基本经济区”虽然如此重要,但这一概念也是基于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地形的特殊性),为了“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3]3},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并非“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3]9}。在这一点上,施坚雅与冀朝鼎的认识是一样的,即中国的市场是区域性的,由此施坚雅提出“巨区理论”,“巨区理论”将中国分为八大巨区,即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华北、西北^{[4]24}。冀朝鼎提及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其实可分别对应于施坚雅所说的八大巨区的西北、华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只是由于交通改善、工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经济联结性增强,才使得历时性的“基本经济区”得以演变为共时性的“八大巨区”。不过冀朝鼎是从历时态的“基本经济区”看王朝兴衰,施坚雅则从共时态的巨区及市场等级体系看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地方社会的构造。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固然幅员广阔,但“中国不是毫无差别地、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5]。施坚雅的研究表明,这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是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地区城市、地区都会、中心都会构成的^{[6]339-340}。刘志伟认为,“施坚雅对我们的启发意义,不在于这些结论性的表述,而在于他从个人理性的行为出发去建立一种关于中国大一统结构及其历史周期的解释”,在于他“从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出发,以乡村中的人的行为都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为前提”^[7]。刘志伟作为“华南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对施坚雅的这一评论,其实也道出了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学术旨趣。

“华南学派”倡导“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强调从地方的动力、从地方本身的活力、从地方的过程去理解大的国家体系的转变,也就是把国家置于地方的历史去理解^[8]。做农村研究,也需要持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理念。在此,“具体的区域”是指能够寻找到地脉、人脉、文脉的地方社会及人群,我们需要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构造、生计方式、传统惯习、外部约束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其实也是试图理解此具体领域的内在发展逻辑,追寻其内生的力量。

由于个人在时间及精力上的限制,加上田野调查的因缘际会,本文仅举三类农村区域调研作为“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尝试。为了形象及方便起见,本文权且将此三类区域称为“隙地”“狭地”“边地”(简称“三地”)。在利用“七普”数据对有关“三地”2010—2020年

① 贺雪峰:《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未刊稿。

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进行面上描述的同时,在以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菏泽市鄄城县和东明县作为“隙地”田野点、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三分的福建沿海莆田孙村作为“狭地”田野点、以西南边陲云南凤庆县和四川凉山昭觉县作为“边地”田野点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对“三地”社会经济逻辑予以深描。

二、“隙地”的县域城乡流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可以发现,全国大型城市周边的县,在 2010 年至 2020 年 10 年间其常住人口呈减少趋势,这说明大型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区域,就是一批远离大城市且往往在数省交界地带的县域,其常住人口却增加了。

在施坚雅的“巨区理论”中,巨区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这些区域体系仅与周围的区域体系具有薄弱的联系。在描绘每个区域体系中层叠交错的城市腹地时,我意识到:它们所共同定义的区域都与地文单元相符合,很少例外。简而言之,似乎每个城市体系都是在地文区域中成长起来的”^{[6]333-337},巨区是以大尺度地文(河流体系和山脉、沼泽、沙漠等交通障碍)定义的区域,拥有核心—边缘结构。可想而知,巨区之间即核心—边缘结构之间是结构中的边缘部分的连接地带,所以巨区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隙地”说法,施坚雅所谓的巨区之间的薄弱联系地带可称之为“隙地”。许倬云关注到“隙地”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性,他认为,中央政府依靠庞大的道路网络、信息网络和行政网络,传达政令、收集信息、汇集资源和分配资源,但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之内,却存在众多“隙地”,其往往是国家最不稳定的部分,历史上农民反叛大多起源于“隙地”。“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五斗米道起于汉中山区,黄巾初起于清徐的乡村……他们在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到星火燎原时,已难以措手。”^[9]许倬云的这个历史洞察与施坚雅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如果置于空间框架中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6]328}的判断,可谓同出一辙。

其实冀朝鼎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基本经济区”,也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如王朝兴衰、版图分合,同时,他还试图以此解释中国当时的政治。他认为“地区关系问题事实上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问题”^{[10]5},这当然不是说地区关系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在缺乏经济纽带联结的情况下,单以军事和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是一个松散的统一,“这种国家内部组织的松散性与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特性,大大地扩大了地区关系问题上的重要性与困难”,这其实也导致形成了“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国家控制的薄弱地带。他强调“在地区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历史全过程的理解,并且为研究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背景”^{[10]118}。冀朝鼎的这一理论展望,在毛泽东 1928 年写就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已经得到深入运用,只是不知道冀朝鼎当时是否读到毛泽东的这一名篇。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11]48}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11]49}。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在此,湘赣边界的地理屏障导致其与外界关系弱化,加上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促进了“隙地”的形成。而地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隙地”进一步拥有独立性,红色政权得以生存下来。这也是米格代尔所说的“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即发生革命的地方“似乎总是那些市场结构

不完善的地区”^[12],所谓“市场结构不完善的地区”,就是还没有形成国家统一市场或者位于中心市场边缘的地区。

由上可见,“隙地”既位于不同地理单元的交界、不同政治势力范围的交界,也位于不同中心市场范围的交界。今天我们借用“隙地”的概念,是取其不同地理单元、不同中心市场范围交界之义。我们所关注的“隙地”,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两省或者三省交界的、远离大型城市的、2010 年至 2020 年常住人口增加的县。根据“七普”数据,我们罗列了“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常住人口增长超过 1 万人的“隙地”(表 1)。

表 1 胡焕庸线以东省份交界 2010—2020 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长 1 万人以上县(单位:万人)

省份	城市	县	六普常住人口	七普常住人口	人口增长	交界省份
安徽	阜阳市	临泉县	154.3218	165.8442	11.5224	豫皖
安徽	阜阳市	阜南县	112.1758	118.3602	6.1844	皖豫
安徽	安庆市	宿松县	57.1025	61.2586	4.1561	鄂皖赣
安徽	阜阳市	太和县	136.1145	137.9982	1.8837	皖豫
安徽	滁州市	全椒县	38.3885	39.5633	1.1748	苏皖
广东	清远市	阳山县	35.6095	36.7175	1.1080	湘粤
广西	玉林市	博白县	134.2504	139.0612	4.8108	桂粤
广西	玉林市	陆川县	76.2372	80.4427	4.2055	粤桂
广西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	29.7244	32.1538	2.4294	桂湘黔
广西	玉林市	容县	63.3139	65.4916	2.1777	桂粤
广西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	40.2054	41.2445	1.0391	湘黔
贵州	毕节市	大方县	77.6324	85.7578	8.1254	川黔渝
贵州	遵义市	习水县	52.3180	58.4947	6.1767	黔川渝
贵州	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	11.8525	15.0457	3.1932	黔湘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29.0960	31.3887	2.2927	黔桂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39.1047	41.2813	2.1766	黔桂湘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35.6255	37.5825	1.9570	黔桂
贵州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126.3521	128.0116	1.6595	云贵
贵州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8.4220	294,490	1.0270	黔渝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	14.4865	15.4896	1.0031	黔桂
河北	邯郸市	曲周县	42.7610	46.3727	3.6117	冀鲁
河北	邢台市	清河县	38.6231	42.1582	3.5351	冀鲁
河北	邯郸市	磁县	40.8166	44.0728	3.2562	冀豫
河北	邯郸市	成安县	37.7398	40.1052	2.3654	冀豫
河北	邢台市	平乡县	30.0029	32.3675	2.3646	冀鲁
河北	邯郸市	鸡泽县	27.4328	29.7425	2.3097	冀鲁
河南	新乡市	辉县	74.0435	84.5588	10.5153	晋豫
河南	开封市	兰考县	67.7826	77.7278	9.9452	鲁豫
河南	新乡市	长垣	80.9535	90.5436	9.5901	鲁豫
河南	周口市	郸城县	100.3910	105.7093	5.3183	豫皖
河南	周口市	鹿邑县	91.0251	95.8617	4.8366	豫皖
河南	商丘市	民权县	70.3428	74.6389	4.2961	鲁豫
河南	商丘市	宁陵县	52.3403	56.2657	3.9254	鲁豫

续表 1

省份	城市	县	六普常住人口	七普常住人口	人口增长	交界省份
河南	商丘市	柘城县	77.8158	79.9213	2.1055	豫皖
河南	濮阳市	南乐县	45.8487	47.6557	1.8070	冀鲁豫
河南	信阳市	固始县	102.3929	104.1400	1.7471	豫皖
河南	商丘市	虞城县	95.4785	97.2091	1.7306	鲁豫皖
河南	洛阳市	新安县	47.0198	48.3375	1.3177	豫晋
湖北	黄石市	阳新县	82.7631	90.1971	7.4340	赣鄂
湖北	黄冈市	蕲春县	72.7805	79.2101	6.4296	鄂赣皖
湖北	咸宁市	通城县	38.0758	42.6288	4.5530	湘鄂赣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来凤县	24.2870	28.3255	4.0385	湘鄂渝
湖北	咸宁市	通山县	36.1079	39.1311	3.0232	鄂赣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咸丰县	30.0618	31.8827	1.8209	鄂渝
湖北	咸宁市	崇阳县	41.0623	42.7130	1.6507	湘鄂赣
湖南	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	41.1539	44.8195	3.6656	湘桂粤
湖南	永州市	道县	60.6299	62.1275	1.4976	湘桂
湖南	郴州市	汝城县	33.0260	34.4617	1.4357	湘赣粤
江西	赣州市	定南县	17.2771	20.9914	3.7143	粤赣
江西	赣州市	上犹县	25.7464	26.8557	1.1093	湘赣粤
江苏	徐州市	睢宁县	103.9315	108.8553	4.9238	苏鲁
山东	菏泽市	鄄城县	104.0690	112.0854	8.0164	鲁豫
山东	菏泽市	巨野县	86.0581	92.3923	6.3342	鲁豫
山东	菏泽市	东明县	71.1080	76.0956	4.9876	鲁豫
山东	临沂市	郯城县	83.8019	88.5156	4.7137	苏鲁
山东	菏泽市	鄄城县	72.1898	74.7972	2.6074	鲁豫
山东	菏泽市	曹县	136.5675	138.4282	1.8607	鲁豫
浙江	湖州市	安吉县	46.6552	58.6409	11.9857	浙皖
浙江	湖州市	长兴县	64.1982	67.3776	3.1794	苏浙皖
浙江	衢州市	常山县	24.1368	25.9966	1.8598	浙赣
浙江	衢州市	开化县	24.5088	25.8810	1.3722	浙赣皖
重庆	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57.8058	60.7338	2.9280	渝湘黔
重庆	重庆市	云阳县	91.2912	92.9034	1.6122	鄂渝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隙地”都是位于内陆的农业县，很少有外来人口来此打工，其常住人口绝大多数属于本地户籍人口，也就是说，其十年来增加的常住人口，基本上是返乡或者返县者。如位于鲁豫皖苏交界的山东省菏泽市可谓“隙地”，其下辖的东明县、鄄城县的常住人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前者增长了 7.02%，后者增长了 7.71%。笔者曾专文探讨过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鄄城县常住人口增长的现象，发现随着县城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原外出务工者部分回流，他们兼顾在家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鲜农副产品的地方性市场，出现了县域内城乡流动的新局面。这样的县域城乡流动“不仅仅是县城与乡村老家之间点对点的流动，而且是县域全域性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13]。其实，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隙地”基本上都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甚至由地方政府组织农民工输出。时过境迁，今天农民工回流，最关键的是在当地可

以找到就业机会,这个就业包括农业和非农就业。而农业就业可以在家,也可以在家附近的农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或者二者兼顾;非农就业可以在家附近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加工车间,也可以在县城,或者二者兼顾。总之,随着乡村道路硬底化、个人机动车的普及、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农业闲暇时间的大大增多,人们已经可以在县域范围灵活弹性多元就业。有传统的在土在乡、离土离乡的,也有离土在乡、离乡在土的,人与土、乡的结合方式,即生计方式在增加。人与土、乡的结合范围及生计范围在扩大,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向。这种现象的发生,与“隙地”远离大城市有着直接的关系,远距离、高物流成本的阻拦,使“隙地”从大城市的虹吸中逸出。而“隙地”的农产品可以靠内需消化吗?笔者在研究上述东明县和郓城县时,曾特别指出它们都是人口过百万的农业大县,是为了强调其内需的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事实上,我们在考虑“隙地”内需的市场规模时还可以超出“隙地”的一县乃至一省之限。“隙地”位于省际结合部,这个结合部虽然被省区的行政区划分割了,但事实上可能是一个跨省区的有着较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和市场圈,这个市场圈为省际结合部的“隙地”所共享,如麻国庆所言:“省际结合部多为具有生态环境、经济区位同一性,地缘结构、文化传统相似性等整体性特征的区域。因此,不能单纯地将省际结合部视为被省际边界割裂的、破碎的、边缘的行政单位的组合,而必须将其置于区域整体观的视角之下。”^①

为什么“隙地”到了现在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逸出大城市的虹吸?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即使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隙地”,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不断增长的。事实上,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也是需要以一定的生活水平为基础的,只有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才更加追求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追求家庭团聚。那些返县返乡的人,既受到大城市的推力,也受到家乡的拉力。对外出打工的大多数人来说,在现有条件下,这种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暂时还无法在大城市实现,返县返乡倒成为比较可行的选择,在县城购房、租房就业并设法让子女入读县城学校,随时从县城返乡照顾老人,就业、育幼、养老三者得以兼顾^[14]。可以说,是“隙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放大了大城市的推力和家乡的拉力,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助推“隙地”逸出大城市虹吸,实现常住人口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对全国范围内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隙地”县进行系统深入的调研,相信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从城市虹吸逸出的拐点及发生机制,有助于我们思考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力量的途径。

三、“狭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

我们往往习惯于说“地广人稀”,但其实还有“地狭人稠”。浙江和福建两省沿海的一批农业县,是比较典型的“地狭人稠”。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全国耕地面积为 19.179 亿亩^②;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数量为 14.1178 亿人。全国人地比例为全国人口数量除以全国耕地面积,得出的平均数为每公顷 11.04 人。而在“地狭人稠”区域,其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二至四倍,属于严重缺地的地方。按理说,这种既是农业县又是地少人多的地方,应该是铁板钉钉的空心化重灾区了,但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这些“地狭人稠”的农业县,恰恰是十年来常住人口普遍增加的区域(表 2)。

从浙西到闽南,“狭地”的农业县不仅缺耕地,还缺水,其不仅在今天出现常住人口增长的情

① 麻国庆主持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西部省际结合部民族地区的内发型发展研究》报告,2016 年。

② 数据来自 2021 年 8 月 26 日自然资源部新闻发布会。

况,历史上也是人口密度高的区域,从人口与资源匹配的角度看,这似乎解释不通。人口与资源匹配的根本就是食物生产与人口的平衡问题,按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前者是独立变量,后者是因变量,就是说,如果粮食产量受阻,人口就得降下来。丹麦农业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认为,人口才是独立变量,人口增长可以“转变为一种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例如用生产饲料喂养牲畜的‘欧洲类型’或采用灌溉的‘亚洲类型’”^{[15]41}，“在中国许多高人口密集度地区,灌溉和多茬复种的普及程度比印度人口密集的地区还要高”^{[15]42-43}。总之,如果耕地不足,就通过改变耕作方式来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引进农业集约化技术以提高劳动效率,“人口密度达到一定水平是引进某些农业技术的先决条件”,“农民必须能够很快适应那些对他们而言全新的农业工具”^{[15]54}。博塞拉普的研究对象是非洲,对亚洲尤其是小农农业技术高度发达的中国来说,其实早已实现了她所说的农业集约化。即便如此,黄宗智还是认为她的理论“明显比较贴近中国的实际”^{[16]5}，“从人口作为肇因而不是变因来看待其与农业经济间的关系,乃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贡献”^{[16]7}。黄宗智接着指出,“从中国厚重的农学和农史角度来考虑,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博塞拉普没有使用而实际上对其理论非常有用的关键词/概念——‘地力’。博塞拉普充分考虑到人力的因素和约束,但她似乎没有想到,其实土地地力也和人力一样是个只能有限扩大的生产要素,不可能像工业经济中的机械(资本)、能源(和技术因素)那样几乎无限地大幅度扩大。更具体地说,在‘集约化’过程中,单位土地每茬的产出也会像每工时的人力产出那样递减。其实,后者之所以会递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地力的约束而不是人力的约束”^{[16]8-9}。

如果我们引进“地力”视角,那么在耕地面积及“地力”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的“内卷化”是不可避免的,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只有跳出农业,寻找非农就业。如果完全依靠农业,根本不可能养活在地的人群。福建莆田沿海农村人多、地少、地力差,是典型的“狭地”“瘦地”。莆田民间流行“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俗语,这其实还不是真正底层人家的写照。如果真穷的话,再瘦的地也要开垦种粮;如果真穷的话,子女大概只有早早干活的命。实际上也是这样,从前莆田沿海农村,男孩一旦过了十岁,家长就要安排其拜师学艺,最常见的手工艺有石匠、木匠、泥瓦匠、裁缝等。这些习惯上被称为农民的人群,虽然世代生息于“狭地”,但在他们的生计方式上,其实一直是兼业的形态。农忙时从事农业,农闲时非农就业,主要从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农业并非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潘维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事实上,温州的农民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农民’。50年代中期的中国,居民们一夜之间被划分成‘农民’和‘居民’,当时不住在‘城里’的人就成了‘农村人’。许多温州商贩变成了‘农民’。”^[17]

在“狭地”,人们的兼业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胡靖认为,“农民的家庭收入一般会随着兼业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但兼业收入基本上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当项目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很快就会面临边际收入下降的拐点”^[18]。就是说,一旦过了拐点,农民就不愿意投入更多劳动力,否则就会影响家庭的农业生产,因为兼业的农民只是利用农闲,他不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这一观察不无道理,但这可能仅仅是劳动力有限的核心家庭的生计安排。对四代、五代同堂的大家庭来说,因为劳动力充裕,为了扩大家庭收入,完全可以突破仅仅在农闲季节兼业的生计模式,安排家庭成员中的一两个男子专门从事某手工艺,不分农忙农闲,长期开展游走式经营。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狭地”的家庭规模比其他地方大,其传统大家庭的比例也比其他地方高。在笔者家乡莆田孙村的邻村,就有一个家庭成员多达三四十人的巨型家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分家。如果要探究“狭地”大家庭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从其生计方式即游走式手工业经营中寻找。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离家在外的时间可长可短,这取决于其需要回家照顾家

庭的迫切程度。如果离家而无后顾之忧,则尽可以在外远距离游走经营。一般情况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的活动半径越大,离家时间越长,经营效益就越好。而大家庭的分工协作、共居同爨正好可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游走式手工业经营的生计方式与大家庭结构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适应的结果。而大家庭结构无疑也降低了人口繁育的成本,促进了人丁兴旺。

表 2 “地狭人稠”区域 2010—2020 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长县

省	市	县	六普常住人口 (万人)	七普常住人口 (万人)	2010 年户籍人口/ 耕地面积(人/公顷)
福建省	漳州市	东山县	21.1505	21.9511	75
福建省	泉州市	惠安县	94.4231	103.0626	45
福建省	莆田市	仙游县	82.4707	90.5068	39
福建省	福州市	连江县	56.1490	639498	38
福建省	泉州市	安溪县	97.7435	100.3599	35
福建省	宁德市	霞浦县	46.1176	47.5936	30
福建省	福州市	闽侯县	66.2118	98.8200	23
浙江省	温州市	永嘉县	78.9154	86.9548	46
浙江省	丽水市	青田县	33.6542	50.9053	44
浙江省	温州市	苍南县	78.8643	84.3959	44
浙江省	丽水市	缙云县	35.8917	40.5318	39
浙江省	温州市	平阳县	76.1664	86.3166	38
浙江省	温州市	泰顺县	23.3443	26.5973	37
浙江省	台州市	天台县	38.2812	47.4711	36
浙江省	温州市	文成县	21.2077	28.8168	36
浙江省	台州市	仙居县	34.2676	43.1888	33
浙江省	丽水市	松阳县	18.5051	20.4880	33
浙江省	台州市	三门县	32.8887	37.9469	32
浙江省	金华市	浦江县	43.7346	46.0726	32
浙江省	绍兴市	新昌县	38.0444	41.9036	27
浙江省	丽水市	云和县	11.1591	12.9216	27
浙江省	衢州市	常山县	24.1368	25.9966	26
浙江省	衢州市	开化县	24.5088	25.8810	26
浙江省	杭州市	桐庐县	40.6450	45.3106	26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海县	64.6074	69.5958	25
浙江省	宁波市	象山县	50.3279	56.7665	25
浙江省	丽水市	景宁畲族自治县	10.7106	11.1011	25
浙江省	丽水市	遂昌县	19.0165	19.4385	22
江西省	萍乡市	上栗县	46.7214	46.9957	41
江西省	赣州市	安远县	34.0740	34.6435	33
江西省	赣州市	定南县	17.2771	20.9914	29
江西省	赣州市	会昌县	44.5137	45.1513	29
江西省	赣州市	信丰县	66.4047	67.3763	27
江西省	上饶市	横峰县	18.4870	18.7326	25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色达县	5.8606	6.4681	32
湖北省	咸宁市	通山县	36.1079	39.1311	31

续表2

省	市	县	六普常住人口 (万人)	七普常住人口 (万人)	2010 年户籍人口/ 耕地面积(人/公顷)
湖北省	咸宁市	通城县	38.0758	42.6288	28
湖北省	黄冈市	蕲春县	72.7805	79.2101	25
湖北省	黄石市	阳新县	82.7631	90.1971	22
湖南省	娄底市	新化县	111.1160	119.6538	30
湖南省	永州市	新田县	32.8982	34.3595	23
湖南省	怀化市	溆浦县	74.1014	75.7797	22
西藏自治区	那曲市	比如县	6.0179	7.2618	30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市	萨嘎县	1.4036	1.6220	22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三穗县	15.5735	16.2798	27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39.1047	41.2813	27
贵州省	毕节市	纳雍县	67.0272	71.6703	27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	28.6322	29.7572	26
贵州省	安顺市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28.4063	29.9696	25
贵州省	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	11.8525	15.0457	25
贵州省	毕节市	织金县	78.4119	81.5661	24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29.0960	31.3887	24
贵州省	六盘水市	水城县	73.6602	74.6407	23
贵州省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8.4220	29.4490	23
广东省	清远市	连南瑶族自治县	12.9258	13.4691	23

数据来源:普查数据来自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耕地面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注:户籍人口/常用耕地面积,福建省为 2010 年数据,其他省为 2006 年数据。

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还造就了“狭地”社会的开放性。“狭地”村庄的社会边界从来就不为其地理边界所限。施坚雅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4]40}。其实,“狭地”村庄的社会边界大大超过施坚雅所谓的“基层市场区域”,众多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广结外向型社会网络,经营范围基本上都是跨乡镇乃至跨县域的。孙村的通婚圈为什么是跨县的,就是因为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牵的姻缘^[19]。

“狭地”的游走式手工业经营造就了其社会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这批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本身就是一群可以随时开展外向型经济活动的稳定队伍(人力资源),而且可以身兼数职,扮演信息采集者、产品推销员、生产组织者、转型导向者等多重角色,这奠定了“狭地”的乡土韧性,即可以捕捉各种转瞬即逝的外部创业机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狭地”人群善用乡土社会网络创业,最终形成“同乡同业”的业态^[20]。我们如果检视浙、闽“狭地”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农业县,几乎都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同乡同业”。“同乡同业”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离土不离乡,是对城乡关系中“边缘-中心”格局的再构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这是“狭地”农业县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奥秘。当然,由于资本开始介入部分资本密集型的“同乡同业”,“同乡同业”也在发生着变化^[21]。

四、“边地”的内发型发展

“边地”在本文是指我国大西南的民族聚居(杂居)区。陶渊明诗曰“心远地自偏”,这是强调心态作用。骆宾王《秋日山行简梁大官》还有“地偏心易远”之叹,这是环境使然。由于地理、交通所限,以及存在语言、技能、经验、习俗等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融合问题,与汉族相比,“边地”的民族地区人群对外出务工比较谨慎。因此,在“边地”,还有不少农户在利用地方特色自然资源,勤勉从事农业,种植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农村的空心化程度低于我国中部地区的省份,体现了内发型发展的逻辑。在大西南“胡焕庸线”两侧,就分布着一些 2010—2020 年常住人口增长的民族地区的县(表 3)。

表 3 云贵川人口增长 1 万人以上民族地区县(单位:万人)

省份	城市	县(县级市)	六普常住人口	七普常住人口	人口增长	省交界或 国境边界
贵州	毕节市	大方县	77.6324	85.7578	8.1254	川黔渝
贵州	遵义市	习水县	52.3180	58.4947	6.1767	黔川渝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龙里县	18.0865	23.6221	5.5356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惠水县	34.2647	39.5878	5.3231	
贵州	毕节市	纳雍县	67.0272	71.6,703	4.6431	
贵州	六盘水市	水城县	70.4615	74.6407	4.1792	云贵
贵州	贵阳市	修文县	24.8926	28.8090	3.9164	
贵州	毕节市	黔西县	69.5947	73.2008	3.6061	
贵州	铜仁市	玉屏侗族自治县	11.8525	15.0457	3.1932	黔湘
贵州	毕节市	织金县	78.4119	81.5661	3.1542	
贵州	铜仁市	德江县	36.7920	39.3596	2.5676	
贵州	安顺市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27.0345	29.3651	2.3306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从江县	29.0960	31.3887	2.2927	黔桂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39.1047	41.2813	2.1766	黔桂湘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龙县	35.6255	37.5825	1.9570	黔桂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定县	23.1118	25.0,146	1.9028	
贵州	毕节市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126.3521	128.0116	1.6595	云贵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丹寨县	12.2430	13.8642	1.6212	
贵州	安顺市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28.4063	29.9696	1.5633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瓮安县	38.0318	39.5536	1.5218	
贵州	铜仁市	江口县	17.2761	18.4764	1.2003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	28.6322	29.7572	1.1250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台江县	11.2319	12.2861	1.542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长顺县	19.1129	20.1540	1.0411	
贵州	铜仁市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8.4220	29.4490	1.0270	黔渝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	14.4865	15.4896	1.0031	黔桂
四川	成都市	金堂县	71.7227	80.0371	8.3144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越西县	26.9896	30.1865	3.1969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布拖县	16.0151	18.5553	2.5402	川滇

续表3

省份	城市	县(县级市)	六普常住人口	七普常住人口	人口增长	省交界或 国境边界
四川	宜宾市	江安县	39.9829	42.4470	2.4641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普格县	15.5740	18.0052	2.4312	川滇
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	石渠县	8.0834	10.3633	2.2799	川藏青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宁县	35.1245	36.9166	1.7921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	22.1505	23.8624	1.7119	云川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雷波县	22.3885	24.0149	1.6264	云川
四川	成都市	蒲江县	23.9562	25.5563	1.6001	
四川	成都市	大邑县	50.2199	51.5962	1.3763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宁南县	17.0673	18.4293	1.3620	云川
四川	乐山市	马边彝族自治县	17.6530	18.8251	1.1721	云川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甘洛县	19.5100	20.5991	1.0891	
云南	昆明市	嵩明县	28.7095	41.0929	12.3834	
云南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腊县	28.1730	30.4950	2.3220	国境交界
云南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	33.1850	35.3720	2.1870	国境交界
云南	昭通市	镇雄县	132.8371	134.9795	2.1424	黔川滇
云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	9.8616	11.4372	1.5756	国境交界
云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	46.3261	47.6587	1.3326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内发型发展是指当地人群在小地区范围内基于传统开拓出发展的途径,注重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12]。在“边地”的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昭觉县和云南省凤庆县调研时,能够强烈感受到小农户的勤劳。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发达,是与中国人民的勤劳紧密相连的,或者说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凤庆县因为缺乏平地,凤庆的小农户大多在陡坡(坡度高达五六十度)开垦,选择小规模多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方式,如茶树与核桃、魔芋套种。我们知道不同农作物的农时不一,单一种植导致农闲时间过长,多种种植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除了多种种植,小农户还种养结合,饲养牛、羊、猪、鸡,这有助于他们将劳动时间从白天的田间延长到夜晚的畜栏,也可以将家庭的半劳力、弱劳力充分利用。在昭觉县龙沟乡龙沟村,我们还看到村民协作放养猪的场景,往往是七八户人家将猪集中起来,每天由其中一户人家出一个人(半劳力或弱劳力)轮流放养。“边地”人民充分利用劳力,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及种养结合的生计方式,其实也是基于地方的经济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利于地产地销,通过在地周期性集市及小农户个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大体解决流通销售;种养结合使小农户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场合可以用自养牛、羊、猪宴请亲友或者送礼,以维持及促进互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意义上,对小农户来说,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农业龙头企业组织的单一种植,是因为那样的话,不仅无自主性、市场风险大,而且还得花费大笔现金购买牛、羊、猪等,最后得不偿失。

李静松在研究中国西南山区农业变迁时发现,在其所选取的广西、云南、贵州的 6 个县、18 个乡镇、54 个村总计 162 个受访农户中,已经形成了以“食物自给程度—市场依赖程度”为划分依据的农户分化,出现农户自循环模式的生计农业和市场大循环模式的产业农业之分。“农户自循环模式是以食物为中心的循环。农户通过在地选留种、社区内/间买种或换种、种植、收获、储藏、自用(粮食和饲料)、售卖(到本地市场)等行为实现农业生产和自我再生产,通过种养结

合及多元作物结构实现营养物的在地循环。种子和食物的交易基本发生在本地市场,因而生产相对独立于外部市场,农户主要通过种养结合、粮饲结合的生产来满足多元自给的需求”^[22]。我们在凤庆县和昭觉县调研时都听到产业农业项目在当地失败的案例,如凤庆县某农业龙头企业曾经推广种植澳洲坚果,农户响应不积极,最终不了了之;也曾有 NGO 在昭觉县推广辣椒种植,当时辣椒市场行情看涨,农民也可以卖得好价钱,但两三年后农民还是改回种植玉米、土豆,原因如上所述。这些产业农业的失败案例,也说明了内发型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边地”农民在开展生计农业时的路径依赖。

当然,“边地”的生计农业也受到产业农业的挑战,因为农民始终需要现金过日子。我们在凤庆县多民族杂居的大寺乡马庄村调研时发现,生计农业为什么还可以持续,除了农民采取套种、种养结合的模式,还与家庭成员在县域内就近打工有关。打工给家庭增加了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就近打工还可以在农忙(如采茶旺季)时回家帮忙。“边地”农民对家庭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合理安排,已经超越了农业领域的套种和种养结合,更不用说也超越了博塞拉普所谓的农业集约化发展。我们于 2022 年 8 月在马庄村调研了小农户的劳动过程,分析小农户制定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地非农就业是小农户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配^①。“边地”小农户的内发型发展使得农业活动较深地嵌入地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空心化。事实上,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昭觉县的常住人口也是不减反增,从 2010 年的 24.0040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25.2435 万人;凤庆县的常住人口仍然减少,从 2010 年的 45.8330 万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38.5420 万人。

五、结语

“隙地”“狭地”“边地”之说只是为了强调“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重要性。从地理区位、人口资源匹配程度以及农业县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这“三地”应该是农村空心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但恰恰相反,从 2010 年至 2020 年,“三地”的常住人口不减反增。我们只有深入具体的地方社会,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地方传统,才能了解行动者的逻辑、行为选择及流动,才能追寻其内生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不是原子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而是作为家庭的一员、社区的一员,是作为社会中的行动者。农村研究或者农民研究光算经济账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社会的、社区的、家庭的研究。我们从“七普”数据中看到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的变化情况,在这个流动过程中,流动的不仅仅是人、物、资金、信息,而且也是个人情感、家庭结构、社区网络在县域范围内的折叠与摊开。

我们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三地”进行类型化的归纳,并分别从县域城乡流动、“同乡同业”、内发型发展视角分析“隙地”“狭地”“边地”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发展到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隙地”“狭地”“边地”的面积在中国版图上的占比不可谓不大,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 吴瑞君.从“五普”到“七普”: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和区域均衡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① 肖汉臻、吴重庆:《小农户自发农业去过密化研究》,未刊稿。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53(5): 174-183.

[2]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3]冀朝鼎,朱诗鳌.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李丹.理解中国农民[M].李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6.

[6]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7]刘志伟.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87.

[8]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229.

[9]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4.

[10]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M].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1.

[13]吴重庆.超越“空心化”: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21(6):91-100.

[14]吴重庆.返县青年与县域乡村振兴[J].青年探索,2023(1):15-17.

[15]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M].罗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6]黄宗智.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7]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28.

[18]胡靖.整体性、组织化与集体经济原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27.

[19]吴重庆.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8.

[20]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J].开放时代,2014(1):145-154.

[21]吴重庆.“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20(5):9-17.

[22]李静松.流变与坚守:中国西南山区农业变迁追踪研究[J].开放时代,2023(1):172-188.

(责任编辑:宋雪飞)

Counter Movement of Rural Depletion in Middle Land of Neighbouring Provinces, Narrow Land and Rimland——In Pursuit of Inner Power

WU Chongq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resident population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counties (county-level cities and county-level districts excluded) during 2010 to 2020. Approximately, agricultural counties with resident population increas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3 types: counties in the middle land of neighboring provinces, coastal counties with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to farmland area two to four times as much as national average level, minority counties in south-western rimland. By looking deep into specific regions and keeping in mind of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source endowment, livelihoods, family structure and local tradi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social-economic logic behind the counter movement of rural depletion in these counties, for achiev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r choices and the 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exploring the inner power of the regional societies.

Keywords: Middle Land of Neighbouring Provinces; Narrow Land; Rimland; Counter Movement of Rural Depletion; Inner Power